

陈芳等著

新感羅綺

中国古代女子服饰时尚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陈芳 等著

新黛罗绮

中国古代女子服饰时尚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陈芳 1999年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史论系，获博士学位。现任北京服装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曾任《艺术设计研究》杂志常务副主编。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传统服饰文化，古代艺术史。有《中西艺术精神的缘起》、《中国先秦与古希腊艺术之比较研究》（台湾）、《大学美术鉴赏》（合著）、《设计的理念》、《雕塑》（译著）、《万物》（合译）、《敦煌服饰暨中国传统服饰文化学术论坛论文集》（主编）等作品。

（按章节顺序）

蒋玉秋 北京服装学院 副教授 博士

张玉安 北京服装学院 教授 博士

贾玺增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 副教授 博士

王子怡 北京服装学院 副教授 博士

陈芳
蒋玉秋
张玉安
贾玺增
王子怡

——
著

粉黛罗绮

中国古代

女子服饰时尚



目 录

[代序：开创中国服饰史研究的新局面](#)

[写在前面](#)

[衣裳之始：先秦女子服饰时尚](#)

[第一节 女子服饰的起源](#)

[第二节 《诗经》中的女子风雅](#)

[楚汉风韵：楚汉女子服饰时尚](#)

[第一节 长袖善舞多属楚](#)

[第二节 严妆汉服永未央](#)

[灵动飘逸：六朝女子服饰时尚](#)

[第一节 红粉佳人效戎装](#)

[第二节 头上“步摇”如飞燕](#)

[国色天香：唐代女子服饰时尚](#)

[第一节 衣裙与鞋子](#)

[第二节 胡服与戎装](#)

[第三节 云鬓与梳子](#)

[第四节 插花与花冠](#)

[简约淡泊：宋朝女子服饰时尚](#)

[第一节 碧罗冠子簇香莲](#)

[第二节 冠儿褙子多风韵](#)

[第三节 彩燕迎春入鬓飞](#)

[衣冠之变：辽金元女子服饰时尚](#)

[第一节 契丹女性“佛妆”考](#)

[第二节 宫衣新尚高丽样](#)

[奢侈风气：明清之际女子服饰时尚](#)

第一节 “卧兔儿”与毛皮时尚

第二节 西风东渐：“披风”的缘起

第三节 雌雄二体的结合：纽与扣

后记

代序：开创中国服饰史研究的新局面

北京服装学院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团队的集体成果《粉黛罗绮：中国古代女子服饰时尚》一书出版在即，承蒙该团队负责人陈芳教授信任，在我得以先睹书稿为快之后，嘱我撰写书序。我于中国古代服饰文化所知甚少，对古代女子服饰时尚更缺乏了解，只能将自己学习后的一些心得写出来，聊充“代序”，以求方家教正。

据我所知，陈芳团队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的研究已经有相当扎实的基础和比较丰厚的成果积累，汇集成专著应是水到渠成之事。去年，我在拜读他们发表在《北京服装学院学报》艺术版《艺术设计研究》中的相关论文后受到鼓舞和启发，曾经在“敦煌服饰暨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学术论坛”（2013年10月）上发表感言，认为中国古代服饰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中最具大众化、民族化、多元化特色，富有时代感和生命力，体现创新性与实用价值的文化门类。我也就拓展学术视野、注重个案研究提出了粗浅的意见。现在，书稿中异彩纷呈的丰富内容，不仅印证了我的认识，而且又启示我对这方面的研究去做进一步的思考。

我十分欣赏陈芳教授在“奢侈风气”一章中的一段话：

正是日常生活的服饰，才能更好地反映一个时代经济、文化和思想的变化，及时地透视出快速变换社会的流行风尚，但如何把握和再现这过往的时尚，并非易事！即使是还原最基本的形制，也缺乏大量的文献、图像和实物材料的支撑，更何况需要从物质文化史角度，来探究服饰与身份阶层之象征、地理环境之差异、工艺水平之高下、审美趣味之

嬗变等要素的关系。虽如此，中国服装史的研究不能停留在前辈大师的通史钩沉上裹足不前，而应该继续他们未竟的事业，补充他们未及的日常服饰的个案研究，从而将中国服装史的研究向前推进。

这就十分清晰而简洁地说明了他们确立“中国古代服饰史研究”这个大课题的出发点及研究对象、方法和目标。在“中国古代服饰史”这个大的“母题”之下，又有若干各具特色的子课题，“女子服饰时尚”即是其中之一。通过本书我们可以看到，作为这个子课题的阶段成果，既有依据历史脉络“纵览”主题的总体学术架构，又有选取典型样式“横截”个案的扎实细致分析。在立足于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开拓视野，转换角度，创新思维与方法，推动了相关研究的深入发展。

我注意到，本论著的作者们十分明确要将我国古代女子服饰时尚的探究，置于整个社会生活史的宽阔视野之下，不仅关注服饰时尚与当时政治思想、经济、军事的密切关系，而且关注服饰时尚与传承有序的精神文化的血肉关联，还特别关注其与物质文化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众所周知，我国留传至今的“正史”典籍（二十五史、十三经等）中的服饰史料基本上是被涵盖在“礼制”的范围之内，远远不能反映它极为丰富的内容，也就远远不能满足研究者的资料需求。因此，以沈从文先生为代表的前辈学者，早已注重对相关文物图像资料的分析，运用“二重证据”乃至“多重证据”对古代服饰进行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由于时代与各种条件的局限，在思想的开放、方法的借鉴、资料的搜集和使用等方面，也都受到局限，无论是在宏观的整体把握上，还是在微观的个案剖析中，都留下了许多有待填补的空间。应该说，前人的遗憾，也是留给后来者的挑战与机遇。陈芳团队接受了挑战，也抓住了机遇。

现在，读了陈芳团队的这本著作，我们得以更明确地认识到服饰时

尚鲜明的时代特征、民族特色与地域特点，认识到它们的共性与个性的辩证统一，认识到它们的包容性、传承性与多元一体性。这些特性，在中国古代女子服饰时尚中表现得尤其明显。例如书中所述及的先秦女子服饰的清纯、质朴、雅致，汉代女子服饰的多种刺绣纹样，六朝女子服饰的灵动飘逸与仿效戎装、军容的风气，隋唐时期的胡风汉韵、葳蕤华彩，宋朝“简约淡泊”里内敛的奢华富贵，元代以后随着东西方各民族文化交流加强外来因素的有机融汇等，都是文化时尚长河中璀璨夺目的浪花。尤其是我国作为一个历史悠久、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文化璀璨的多民族统一国家，一方面，服饰时尚不仅往往得力于历朝历代统治集团上层人物的喜好、推崇与倡导，更关乎各地、各族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需求，关乎物质生产的丰富或贫瘠，关乎官方、民间文化交流的盛与衰，当然也会与社会的稳定与动荡相关联；另一方面，虽然鉴于时尚本身内涵的创新活力，它常常关涉社会的变革、进步，也不断会花样翻新，但因为儒家文化传统与礼制的影响，因为统一国家的强大向心力，也因为相对稳定的生活习俗的渗透和审美心理的“从众”导向，它又具有相对稳固的传承性，具有“有容乃大”的气魄，还常常表现为积极的周而复始的“旧”与“新”的调谐能力，有时还表现出使人惊叹的“超现实”的前瞻性。本书的作者们无疑是摸准了中国古代女子服饰时尚的脉搏，故不仅能很好地把握与理清上下几千年女子服饰时尚的主要脉络，也能将各时期一个个典型个案条分缕析得清晰、鲜活。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全书每一章节插配的不少精美图片，与文字叙述相得益彰、相映成趣，成为全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总之，本书可以称得上是一部“中国古代女子服饰时尚史纲要”。

诚然，“中国古代女子服饰时尚”作为一个子课题，本书还留下了不少值得进一步探究的“空间”，距离一部完备的“中国古代服饰史”当然更有大量的工作要做。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本书作者们已经比较自觉地

涉足美术史、科技史、文化交流史、物质文明史等领域，努力尝试运用多学科综合交叉、比较研究的方法，注意搜寻与排比新、旧资料，提出新问题，得出新认识，有了不少新的突破。但是一门学术史的科学建构，不仅需要我们继续在内容与风格的源流研究、特质研究与比较研究上苦下功夫，还必须在规律探寻、理论总结上勤于思考与善于提炼。陈芳团队这本专著的问世，有力地证明了他们已经开创了中国服饰史研究的新局面；在祝贺他们的同时，也衷心期盼他们能为所倾心钟爱的学术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柴剑虹^[1]

2014年2月

^[1] 柴剑虹，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华书局编审。

写在前面

学术生涯是一次有趣的人生旅程，有时需要激流勇进，有时需要理性思索，但更多的时候，不妨追随自己的兴趣和心性，兴之所至，或可以渐入佳境。我与中国古代服饰史的结缘，便是在北京服装学院工作多年以后，自然而然产生的，虽跻身于服装史界日短，更谈不上学术造诣的精深，却倍感肩上担子的沉重。尤其是2011年在学校的支持下，成立了中国历代服饰时尚研究的学术创新团队以后，一直希望产生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前瞻性成果，以此开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新篇章。回想沈从文先生在如此艰辛的条件下研究中国古代服饰，常常感慨万千！老一辈学者走过了筚路蓝缕的道路，取得了服饰通史研究的丰硕成果。今天的我们，不能停留在前辈大师的通史钩沉上裹足不前，而应该继续他们未竟的事业，补充他们未及的日常服饰的个案研究，从而将中国古代服饰史的研究向前推进。

广义上讲，中国古代服饰史是艺术史的一个分支，但在国内学界始终处于较为边缘的地位，原因在于其自身的学科建设水平相对薄弱，缺乏系统的理论架构和高水准的学术成果，因此，难以与主流学术系统建立平等的对话关系，反过来又阻碍此学科话语权的提升。目前，中国古代服饰史的研究可以概括为三种现状：一是侧重礼服，二是侧重形制，三是方法单一。首先，综观服饰通史类书籍，礼服研究所占的比重是相当大的，对古代日常服饰则较少涉及，直到今天，我们对古人日常服饰的穿着搭配方式并不太清楚，急需新的日常服饰的研究成果进行补充。另外，对于日常服饰的研究也能管窥当时的服饰流行趋势，“时尚”不是今天才有的概念，古代文献中已经出现“时尚”或“时世装”的词汇，各个时期也存有服饰时尚流变的文献记录，这说明不同朝代都存在日常服饰

的流行趋势，只是相关研究滞后。其次，服装史研究的相关论文，数量非常大，但基本停留在形制探讨的层面，对形制背后的服饰文化却关注不多，研究深度则难以彰显。至于研究方法，相对比较单一，就服饰讨论服饰的情况比较普遍，跨学科整合其他领域的知识和研究方法的相对少见。上述情况表明：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在沈从文先生等老一辈学者的研究成果之后，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成绩，但突破性进展仍需时日。然而，新的考古发现以及大数据时代材料的丰富，给今天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基于此，本书的研究对象主要锁定在中国古代女子的日常服饰，希望借此引出古代女子时尚的相关讨论，弥补服饰通史以礼服为主叙事不足的缺憾，重新评价所谓服饰史的主体到底为何。肯定一种多元地了解历史的维度，同时，也符合史学研究的新方向：专题生活史研究。专题生活史的研究可以有非常广泛的主题，如饮食、服饰、建筑、旅行、娱乐、生命循环、性别与私人生活等诸多领域，我们锁定在服饰领域。

研究中国古代服饰史，如果只是从形制到形制，将无法深入进行下去。倘若只关注服饰领域的知识，同样难以产生前瞻性的成果。只有采用前沿的研究方法，纳入多学科的视野考量，才是行之有效的方法。目前，国际上在研究实用器物领域比较前沿的方法是物质文化的方法。“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是在美国人类学界首先使用的名词，之后逐渐在艺术史、经济史、社会史、科技史等领域运用。牛津大学柯律格教授被推为将“物质文化”用于艺术史研究领域的第一人。他大概从1980年开始使用“物质文化”一词来代替以前的“装饰艺术”或“实用艺术”等词汇。“装饰艺术”和“实用艺术”，用英语表达即decorative art, applied art, 都暗示你所处理的对象是低等级的、二流的、简单的，不是真正的纯艺术。而使用前沿的词汇“物质文化”时，不仅不暗示研究对象的低等地位，而且彰显其本身的价值，即不强调对象的等级地位，而

强调物质对象的文化属性。因为“物质文化”是一个比较中性的词汇，一个学术性很强的词汇，即使是受过良好教育的英国人，如果不在大学或博物馆工作，也从来不会使用这个词，更不明白它的含义。柯律格认为在英语中使用decorative art这个词，已经意义不大了，英国学术界已用“物质文化”替代“装饰艺术”、“实用艺术”或者“工艺美术”。

那么，用物质文化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服饰，必须结合社会学、文化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经济学、艺术学、民族学、心理学等跨学科的知识，从个案研究入手，逐步深入展开。这种方法不仅关注服饰的形制，更注重与服饰相关的物质文化的方方面面，对服饰的研究将更加全面、深入。研究对象或可以相当广泛，由于时间所限，本书主要观照先秦、汉代、六朝、唐代、宋辽金元、明清流行的女子服饰，选取典型的个案展开研究，诚然不可涵盖历朝历代女子服饰的全貌，但管中窥豹，或可以明了一些具体的问题，并借由这些问题透射出服饰与当时物质文化的关联。最终希望采用新材料、新方法、新视角，将宏观论述、中观考察、微观分析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

通过多年的努力，我们中国历代服饰时尚研究学术创新团队在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一点成绩，但对比沈从文先生在巨大成就面前还称自己“好像打前哨的，小哨兵样子，来做些试探，探路子”，我们还有什么理由骄傲自满呢？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学科建设薄弱，我们也只是刚刚开始取得初步的成果，向前看，任重而道远……

衣裳之始

先秦女子服饰时尚



在中国古代传说中，盘古开天辟地之后，未有人民，女娲便模仿自己和兄长伏羲的模样抟土造人，从此有了人类的开始^[1]。伴随着天地初开与男女出现，裸态的人类如何披上了第一件衣裳，他们如何迈出创造服饰的第一步；服饰的男女之别始自何时；一枚骨针，一个纺轮，一缕丝线，如何经由岁月之手化为服用之必需，再经时风磨砺吹拂，终成时尚之物，更替演变……让我们从众多的历史资料中抽丝剥茧，探寻女子服饰的起源与先秦女子的风雅之美。

第一节 女子服饰的起源

关于服饰起源，后世的人们有着种种猜测——保护说、装饰说、遮羞说等。众多说法中，或许远古人类生存的本能与生活的基本需要，更易解释为服饰产生最根本的动因，这也更加符合《释名·释衣服》之解，即“衣，依也，人所依以庇寒暑也”^[2]。对服饰有案可稽的最早记录可追溯到黄帝尧舜时期，《周易·系辞下》有：“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3]王逸《机赋说》有：“古者衣皮即服装也，衣裳未辨。羲、炎以来，裳衣已分，至黄帝而袞冕。”这些记述大致描绘了衣服形成的过程：上古时代人们所围披的皮毛就是衣服，到黄帝尧舜时不仅结束了史前服装的简单围披状态，并且将服装定型为上衣下裳，服装的功用也从物理上的遮寒避暑上升为精神所需，而至商周，中国服装体系的文化属性逐步明朗。

一、女子服饰起源的条件

劳动，创造了工具也创造了服饰。

虽然关于远古时代纺织服饰的实证资料极其有限，但可以推断大约在距今50万——4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人类开始装扮自身，而在距今4万——1.5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原始衣物已渐为发达。到了新石器时代，麻葛、蚕丝、纺轮已经普遍应用，原始织造技术趋向成熟。材料、工具、技术三大因素的完善，为原始成衣提供了物质上的保障，这一切令服装的出现成为可能，并直接促成了人们经由对自然物的改造而获得为我所用的服装。

1. 材料

（1）羽皮。中国先民利用动物毛羽的历史，也可以追溯到很遥远的时代。由于毛织物在中原温湿气候下难以保存，在历年的考古发掘中鲜有发现。但在诸多古代文献中，我们可以找到人们利用羽皮的记载。如《礼记·礼运》：“昔者先王未有宫室……未有丝麻，衣其羽皮。后圣有作……治其麻丝，以为布帛。”^[4]《韩非子·五蠹》有：“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由此可以看出，上古时期的人们已开始狩猎动物而食，并取其皮毛羽毳为衣。

（2）麻葛。《韩非子·五蠹》记载上古尧帝的服装是“冬日麕裘，夏日葛衣”。麻葛用于纺织品，在考古发掘中也得到了颇多实证。在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中，出土了三块距今6000年的炭化葛纤维织物残片^[5]；河南郑州青台遗址出土的距今5500年的红陶片上即粘附有麻布^[6]；在浙江吴兴钱山漾距今4700年的居民遗址中，出土的一批织物残片经分析也有用苧麻纤维织造而成者^[7]……这些材料充分说明，在新石器时代人类使用植物纤维作为衣料已非常普遍。

（3）蚕丝。中国先民何时开始利用蚕丝，历来有不同说法，如黄帝时期其正妃嫫祖西陵氏“教民养蚕”的传说，《古今图书集成》中关

于“伏羲氏化蚕丝为穗帛”的记载，以及民间流传的“马头娘娘”化而为蚕的故事，等等。这些故事虽多出自后人的推想，但其养蚕缫丝之说与事实并不太远，更多实证也为我们展现了中国丝绸纺织的历史。如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中发现了距今6000年的象牙骨盅上刻有四条蚕纹^[8]，山西夏县西阴村发现了距今4700年的半颗蚕茧^[9]，最重要的发现资料是钱山漾遗址中出土的黄褐色的绢片和炭化了的丝线、丝带^[10]（图1-1）。不难看出，在生产发展极为缓慢的新石器时代，中国的缫丝织绸水平已经相当成熟。



图1-1 绢片（浙江吴兴钱山漾新石器遗址，黄能馥、陈娟娟《中国丝绸科技艺术七千年》）

2. 工具

（1）石器、骨针。距今50万年的北京猿人，已经开始大量使用石器（图1-2），包括砍斫器、刮削器、锥状器等。那么当冬季严寒之时，他们有否可能用石器削刮兽皮或切割茎叶，磨骨为针，抽筋渍麻为线，连料为衣呢？在距今2.5万——1.8万年的山顶洞人遗址中发掘出一枚骨针（图1-3），针长82毫米，直径3.1——3.3毫米，针孔直径1毫米，针身圆滑，针尖较锐利。而发现骨针数量最多的当属陕西西安半坡新石器遗址，多达281枚，针孔仅0.5毫米^[11]，如此细小的针孔，说明其